

旧题中开出的新意：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概念新解

——以对孙中山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的阐发为例 基于产品特性的企业竞争理论研究述评论艺术对李渔造园思想的影响

□张乾坤陆文学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孙中山研究所—广东—中山 528400—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 在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里,就民族主义而言,一些论点往往与国民党宣言、党章等正式场合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但或许正是在这些非正式场合的宣言、政纲的谈话才能反映出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因为孙中山不同论述产生的矛盾,使得很多孙中山研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很多论据都被研究者选择性忽略。如果我们能正视孙中山的实际心理历程,对他的一些真实说法进行阐发,我们可以发现真实的孙中山思想,而对这些新思想,如果我们能赋予它现代意义,它仍然能够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带来积极作用。在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里,就民族主义而言,一些论点往往与国民党宣言、党章等正式场合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但或许正是在这些非正式场合的宣言、政纲的谈话才能反映出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因为孙中山不同论述产生的矛盾,使得很多孙中山研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很多论据都被研究者选择性忽略。如果我们能正视孙中山的实际心理历程,对他的一些真实说法进行阐发,就可以发现真实的孙中山思想;而对这些新思想,如果我们能赋予它现代意义,则它仍然能够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民族问题解决带来积极启发作用。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李渔都是明清时期的一位造园大家。他的造园思想集中体现在《闲情偶寄》之中。李渔的造园思想不仅丰富深邃,而且还极具个性特色。他用艺术的眼光看待造园活动,认为造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活动。因此,李渔的艺术素养、艺术个性乃至艺术审美理想对于他的造园思想直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在园林居室的布置上,李渔习惯用字画等艺术品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在园林的建造技巧上,李渔认为作文和绘画与造园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在园林的艺术审美追求上,李渔不仅重视园林的写意功能,而且还非常注重营造园林的艺术韵味;在造园个性上,李渔主张独创、反对窠臼的艺术个性更是直接影响了他的避免趋同、力求独创的造园品格。

[关键词] 民族;国家;民族的客观特质;民族的主观特质;国族主义;公民社会李渔;艺术;园林;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7 G3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1)06-0065-07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扶邻在其《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孙中山》一书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有过这样一番评论:“著名的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指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笔者按),算不上系

[收稿日期] 2011-01-04-2215

[基金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团队(2009JXTD33)

[作者简介] 陆文学(1971-),男,宁夏灵武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孙中山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学、中国近代史研究。张乾坤(1969-),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带格式的

批注 [O1]: 原文为博弈模型。参考修改意见1、2。

统的政策指导。确定为孙中山的政治基本原理的最后的改写本及后来成为国民党经典和中国学生必修课的,是仓促拟就的连串的讲稿,冗长乏味,离题,说教,前后矛盾,论据也有差错。……除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王朝以外,三民主义在二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有过不高的评价^[1]。

从总体上来讲,虽然史扶邻这样的评价还算还算中肯,比较客观,1924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确也冗长,三民主义思想在二十年里也没有明显改变,而民族主义思想确有过从反满到反帝的根本转变,但是,不能否定,孙中山经过二十年不断吸收当时西方思想界成果,并经过自己一番思考加工所表达出的三民主义,新内容对中国近现代政治走向是有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部分中的反帝思想,对近代中国革命有很大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目标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某种意义的延续,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影响力是长远的。

孙中山在海内外华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思想的影响力至今还存在。今天,孙中山在台湾仍被称之为国父,台北建有国父纪念馆,三民主义仍然作为国民党的主义被继承。在大陆,孙中山的地位也很崇高,官方一直尊称其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孙中山研究多年来一直是显学。因此,即使从现实意义考量,在制定当下国家民族政策、确定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安排相应地制度建设,从其思想中挖掘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内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正如史扶邻所言,孙中山从未中断过阅读西方文献,虽然是经常不加辨别就大量引用,但勇于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开风气之先却是孙中山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从孙中山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很多在今天看来也有启示意义的观点。

在孙中山其晚年长达十五万多字著名的三民主义演讲里,他孙中山提出了很多新论点说法,这些论点说法往往与国民党宣言、党章等正式场合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让很多学者不解。但或许在那些非正式场合的谈话的讲话而不是党章,才能反映出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因为上述矛盾的存在,使得很多孙中山研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很多论据都被研究者选择性忽略。如果我们能正视孙中山的实际心理历程,对他的一些真实说法进行阐发,我们可以发现真实的孙中山思想意图。而进一步,

对他的那些与之前其论述不同的新观点进行阐发,比如他讲到的“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而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这句话,能让我们能想到发现其思想中与现代学者关于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的论述相联系的地方,值得分析研究。而比如他的其“国族”主义观点对今天多民族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实际在某种程度,有些学者是赞成的。人口繁衍与民族延续的关系也值得探讨。

当然,就现实作用而言,我们应该遵循扬长避短、弃其糟粕、取之精华的态度研究和学习孙中山的思想。我们知道,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事物一分为二来看,结果总会客观一点。孙中山不是神,是个影响力至今非常大的平凡伟人。在很多方面,他不可避免有着一个普通人的浅薄,也会犯错误。这是不能完全否认的。仰视地看待一个人,就看不清他所看对象的脚下走出来的是一条怎样的路,不能看清所要看的人的真正面貌。因此,以客观的角度观看伟人所做的事情和说法,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他,从而才能更好地学习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扶邻在其《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孙中山》一书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有过这样一番评论:“著名的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指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笔者按),算不上系统的政策指导。确定为孙中山的政治基本原理的最后的改写本及后来成为国民党经典和中国学生必修课的,是仓促拟就的连串的讲稿,冗长乏味,离题,说教,前后矛盾,论据也有差错。……除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王朝以外,三民主义在二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4]

从总体上来讲,虽然史扶邻这样的评价还算中肯,比较客观,1924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确也冗长,三民主义思想在二十年里也没有明显改变,而民族主义思想确有过从反满到反帝的根本转变,但是,不能否定,孙中山经过二十年不断吸收当时西方思想界成果经过自己一番思考所表达出的三民主义新内容是有影响力的,尤其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部分中的反帝思想对近代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目标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某种意义的延续,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影响力是长远的。

孙中山在海内外华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思想的影响力至今还存在。今天,孙中山在台湾仍被称之为国父,台北建有国父纪念馆,三民主义仍然作为国民党的主义被继承。在大陆,孙中山的地位

带格式的: 行距: 最小值 15.2 磅

也很崇高,官方一直尊称其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孙中山研究多年来一直是显学。因此,即使从现实意义考量,在制定当下国家民族政策、确定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安排相应地制度建设,从其思想中挖掘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内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正如史扶邻所言,孙中山从未中断过阅读西方文献,虽然是经常不加辨别就大量引用,但勇于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开风气之先却是孙中山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从孙中山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很多在今天看来也有启示意义的观点。

在孙中山晚年长达十五万多字的三民主义演讲里,他提出了很多新论点,这些论点往往与国民党宣言、党章等正式场合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但或许在那些非正式场合的谈话才能反映出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因为上述矛盾的存在,使得很多孙中山研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很多论据都被研究者选择性忽略。如果我们能正视孙中山的实际心理历程,对他的一些真实说法进行阐发,我们可以发现真实的孙中山思想。而对他的那些与之前其论述不同的新观点进行阐发,比如他讲到的“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而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这句话,能让我们想到现代学者关于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的论述,值得分析研究。而他的“国族”主义观点对今天多民族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实际在某种程度,有些学者是赞成的。人口繁衍与民族延续的关系也值得探讨。

当然,就现实作用而言,我们应该遵循扬长避短、弃其糟粕、取之精华的态度研究和学习孙中山的思想。我们知道,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事物一分为二来看,结果总会客观一点。孙中山不是神,是个影响力至今非常大的平凡伟人。在很多方面,他不可避免有着一个普通人的浅薄,也会犯错误。这是不能完全否认的。仰视地看待一个人,就看不清他所看对象的脚下走出来的是一条怎样的路,不能看清所要看的人的真正面貌。因此,以客观的角度观看伟人所做的事情和说法,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他,从而才能更好地学习他。

一、民族与国家

从整个三民主义演讲中民族主义部分来看,孙中山当时对于民族和国家之概念间的不同是经过一番思考,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的。他以民族国家概念辨析入手,一步一步论述他的观点:在中国要搞

国族主义,否则中国就要亡。

在他看来,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国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就是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由家族再到宗族,再到国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的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2]408}在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时,孙中山的认识和写于1919年的三民主义未刊稿中所表露出的思想出现了差异。与1919年三民主义未刊稿不同,1924年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里,美国“熔炉”主义不再是中国的效法对象。以汉族为中心的由家族到宗族,再到国族的国族主义思想完全取而代之了“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治之’”的思想^{[2]615}。

孙中山以香港对于英国而言为例,论述了他的观点:“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2]406}今天在我们看来是有点奇怪,因为1924年孙中山进行三民主义演讲的时候,居然认为香港属于大英帝国。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香港是英国的,香港属于大英帝国。而且他并没有因为香港被侵占而显得愤怒。他也认为高丽、台湾是日本国的^{[2]410}。当然,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才使他相信国家要靠武力的霸道手段来实现,而英国使用霸道手段使香港成为了大英帝国的领土也就不足为怪。

他这样讲到:“再像香港,是英国的领土,其中的民族有几十万人是中国的汉人参加在内,如果说香港的英国国族就是民族,便不适当。……像造成香港的原因,并不是几十万香港人欢迎英国人而成的,是英国人用武力割据得来的。因为从前中国和英国打仗,中国打败了,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割到英国,久而久之,才造成现在的香港。又像英国造成现在的印度,经过的情形也同香港一样。英国现在的领土扩张到全世界,所以英国人有一句俗话说‘英国无日落。’……像英国这样大领土,没有一处不是用霸道的。至于造成民族便不同,完全是由于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强。像香港几十万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民族是自然而然的,无论英国用什么霸道都是不能改变的。”^{[2]405-406}

通过对民族和国家概念的辨析,孙中山总结出所谓国家是以暴力性为根本特点的团体;而民族则是通过自然力形成的团体。

现代民族国家,即英语的“nation state”,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物。“state”是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

家,而“nation”则是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国家。前者是客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后者则基本是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构建产生的,美其名曰“nation building”,不少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前殖民地国家,今天还在国家构建过程中^[3]。的确,从拉丁美洲的国家形成历史,从非洲国家的形成历史来看,国家是建构出来的,这样的说法确实很有根据。

同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民族概念相比,孙中山对国家的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国影响力小,而大国影响力大,国家实力的强大与否直接决定它的话语权。

当然孙中山对民族更多的从客观角度进行认识忽略了民族的主观性(心理感受)特点。也就是说血统(肤色)、生活方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自然力”并不一定能将一群人(一个自认为是属于共同民族)分成不同的民族。比如在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之间在上述“自然力”上并不一致,但不影响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他们都可以唱着“我们的大中华呀,好大的一个家”,载歌载舞,欢庆节日。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了,在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只能是配角的角色,迟早会被汉族同化掉的^{[2]469}。如此看来,孙中山作为大汉族主义者被诟病就不难理解。他不知道,他的这番论述实际是他1919年民族“熔炉”思想的倒退。至少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心理感受上,老是强调汉族的同化力有多么强的说法,比“五族共和”思想,比“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的思想,更不利于少数民族对国家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且对同化的强调,对中国是单一民族的强调,反映了孙中山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上,没有将民族与国家自觉分开。他自革命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关系的认识,对满洲人不是中国人的认识,似乎能透露出他有时会不自觉地民族与国家等同起来。即汉族代表中国,满族即是外国。

《辞海》上的对国家的解释是: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而民族则是某种至少具有“共同文化”的共同体。斯大林为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下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定义,他说:“民族,民族是什么呢?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

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4]

恩格斯认为国家与民族组织相比有这样一个特点:不是按血缘关系,而是按地区划分和组织它的国民;设立了公共权力,并由于阶级对立的尖锐化等因素而日益加强。总之,国家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而民族则更多的是文化上相同的一群人。

这样说来,孙中山所讲的霸道正是国家的特征,同恩格斯对国家的特点的认识有很大的相似性。用不太准确的表述就是国家是政治性很强的团体,以暴力为基础,强调统治和治理;而民族则是文化性很强的团体,以文化作为存在的纽带,多以语言、宗教、习俗作为存在的基础,强调身份认同,心里归属。

国家和民族是有区别的,虽然在汉语里,我们把英文nation有时翻译成“民族”,有时翻译成“国家”,但是一个民族(nation)未必就是一个国家(state)。民族并不一定以国家的形态存在。今天生活在西亚的库尔德人是一个拥有千万人的大民族,但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叫做库尔德的国家。也许未来库尔德人通过努力会成为一个国家,但它一定是要进行人为地努力才能完成这一目标。与此同时,问题也会接踵而来,库尔德人主要分布的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它们允许库尔德人从自己的国家分离出去建立新的国家吗?

今日世界之国家及其疆域的格局基本上是二次大战之后确立下来的。面临分裂势力的此起彼伏,不靠国家暴力是很难维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比如土耳其之对库尔德工人党分离势力,西班牙对巴斯克埃塔组织分离势力,斯里兰卡之对泰米尔猛虎组织分离势力,都要靠这些国家强大的武力做后盾,遏制国家分裂势力。同时,世界各国互相承认别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支持别国对本国民族分裂势力的打击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的话,这个世界不知将有多少国家。而且最要命的是,一个民族的领土范围究竟有多大?其疆界是否在历史上一直是确定不变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民族?其活动范围千年以来,始终不变?不用说,答案全部是否定的。显然,民族不可能等于国家。

基于世界需要稳定秩序的考虑,今天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基本上都承认二战后的国家国际政治格局,避免干涉别国内政的事情发生,不支持

某个国家损害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分裂势力。因为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你支持了别的国家的分裂势力,相当于也间接支持了自己本国的分裂势力。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国际秩序以及本国内部稳定来看,现代国家的维系,一方面要靠武力来支持和维持,一方面还要承认现实的国际关系框架。

所以从国家需要靠暴力来维系的角度讲,孙中山所讲的国家是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一个团体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现代国家的存在不能离开历史背景和现实现状。同样是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国土沦丧,中国政府可以收回香港,却不能收回库页岛。如果没有对近代欧洲列强“开疆拓土”的反思,大国还以武力扩大国家的领土面积,人类不知要发生多少次战争!

国家不等于民族,民族之间不同化不影响国家的存在。多民族共处一国已经是当今大部分国家的现实状况。对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势力,崇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的公民社会是最佳武器。从整个三民主义演讲民族主义部分来看,孙中山当时对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同是经过一番思考,有他比较清楚的认识的。他以民族国家概念辨析入手,一步一步论述他的观点:在中国要搞国族主义,否则中国就要亡。

在他看来,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国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就是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由家族,再到宗族,再到国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的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回复起来。”^[23]在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时,孙中山的认识和写于1919年的三民主义未刊稿所表露出的思想出现了差异。与1919年三民主义未刊稿不同,1924年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里,美国“熔炉”主义不再是中国效法的对象。以汉族为中心的由家族,到宗族,再到国族的国族主义思想完全取而代之了“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的思想。^[24]

孙中山以香港对于英国而言为例,论述了他的观点:“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24]今天在我们看来是有点奇怪,因为1924年孙中山进行三民主义演讲的时候,居然认为香港属于大英帝国,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香港是英国的。而且他并没有

因为香港被侵占而显得愤怒。他也认为高丽、台湾是日本国的。^[25]当然,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才使他相信国家要靠武力的霸道手段来实现,而英国使用霸道手段使香港成为了大英帝国的领土也就不足为怪。

他这样讲到:“再像香港,是英国的领土,其中的民族有几十万人是中国的汉人参加在内,如果说香港的英国国族就是民族,便不适当。……像造成香港的原因,并不是几十万香港人欢迎英国人而成的,是英国人用武力割据得来的。因为从前中国和英国打仗,中国打败了,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归割到英国,久而久之,才造成现在的香港。又像英国造成现在的印度,经过的情形也同香港一样。英国现在的领土扩张到全世界,所以英国人有一句俗话说‘英国无日落。’……像英国这样大领土,没有一处不是用霸道的。至于造成民族便不同,完全是由来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强。像香港几十万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民族是自然而然的,无论英国用什么霸道能改变的。”^[26]

通过对民族和国家的辨析,孙中山总结出,所谓国家是以暴力性为根本特点的团体;而民族则是通过自然力形成的团体。

现代民族国家,即英语的“nation-state”,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物。“state”是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家,而“nation”则是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国家。前者是客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后者则基本是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构建产生的,美其名曰“nation-building”,不少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前殖民地国家,今天还在国家构建过程中。^[27]的确,从拉丁美洲的国家形成历史,从非洲国家的形成历史来看,国家是建构出来的这样的说法确实很有根据。

同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民族概念相比,孙中山对国家的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国影响力小,而大国影响力大,国家实力的强大与否直接决定它的话语权。

当然孙中山将民族更多的从客观角度进行认识忽略了民族的主观性(心理感受)特点。也就是说血统(肤色)、生活方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自然力”并不一定能将一群人(一个自认为是属于共同民族)分成不同的民族。比如在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之间在上述“自然力”上并不一致,但不影响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他们都可以唱着“我们的大中华呀,好大的一个家”,载歌载舞,欢庆节日。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内少

数民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了,在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只能是配角的角色,迟早会被汉族同化掉的。^[1]如此看来,孙中山作为大汉族主义者被诟病就不难理解。他不知道,他的这番论述实际是他民族“熔炉”思想的倒退。至少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心理感受上,老是强调汉族的同化力有多么强,比“五族共和”、比“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的思想更不利于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且对同化的强调,对中国是单一民族的强调,反映了孙中山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上,没有将民族与国家自觉分开。他自革命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关系的认识,对满洲人不是中国人的认识,似乎能透露出他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民族与国家等同起来。即汉族代表中国,满族既是外国。

《辞海》上的对国家的解释是: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2]而民族则是某种至少具有“共同文化”的共同体。斯大林为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下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定义,他说:“民族,民族是什么呢?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3]

恩格斯认为国家与民族组织相比有这样两个特点:不是按血缘关系,而是按地区划分和组织它的国民;设立了公共权力,并由于阶级对立的尖锐化等因素而日益加强。总之,国家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而民族则更多的是文化上相同的一群人。

这样说来,孙中山所讲的霸道正是国家的特征,同恩格斯对国家的特点的认识有很大的相似性。用不太准确的表述就是国家是政治性很强的团体,以暴力为基础,强调统治和治理,而民族则是文化性很强的团体,以文化作为存在的纽带,多以语言、宗教、习俗作为存在的基础,强调身份认同,心里归属。

国家和民族是有区别的,虽然在汉语里,我们把英文nation有时翻译成“民族”,有时翻译成“国家”,但是一个民族(nation)未必就是一个国家(state)。

民族并不一定以国家的形态存在。今天生活在西亚的库尔德人是一个拥有千万人的大民族,但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叫做库尔德的国家。也许未来库尔德人通过努力会成为一个国家,但它一定是要进行人为地努力才能完成这一目标。与此同时,问题也会接踵而来,库尔德人主要分布的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它们允许库尔德人从自己的国家分离出去建立新的国家吗?

今日世界之国家及其疆域的格局基本上是二次大战之后确立下来的。面临分裂势力的此起彼伏,不靠国家暴力是很难维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比如土耳其之对库尔德工人党分离势力,西班牙对巴斯克埃塔组织分离势力,斯里兰卡之对泰米尔猛虎组织分离势力都要靠强大的武力做后盾遏制国家分裂。同时,世界各国互相承认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支持别国对本国民族分裂势力的打击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的话,这个世界不知将有多少国家。而且最要命的是,一个民族的领土范围究竟有多大?其疆界是否在历史上一直是确定不变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民族,其活动范围始终不变?显然,民族不可能等于国家。

基于世界需要稳定秩序的考虑,今天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基本上都承认二战后的国家政治格局,避免干涉别国内政的事情发生,不支持某个国家的损害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分裂势力。因为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你支持了别的国家的分裂势力,相当于支持了自己本国的分裂势力。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国际秩序以及本国内部稳定来看,现代国家的维系,一方面要靠武力来支持和维持,一方面还要承认现实的国际关系框架。

所以从国家需要靠暴力来维系的角度讲,孙中山所讲的国家是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一个团体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现代国家的存在不能离开历史背景和现实现状。同样是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国土沦丧,中国政府可以收回香港,却不能收回库页岛。如果没有对近代欧洲列强“开疆拓土”的反思,还以武力扩大国家的领土面积,人类不知还要发生多少次战争!

国家不等于民族,民族之间不同化不影响国家的存在。多民族共处一国已经是当今大部分国家的现实状况。对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势力,崇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的公民社会是最佳武器。

二、民族的客观特质和主观特质

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群体和身份认同。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思想也是“我群”和“他群”相区别的群体和身份认同。现在有很多学者相信民族和国家联系起来是近代的事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近代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而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则说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民族的定义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关于什么是民族和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相关内容应该是什么,在历史上又曾经有过什么变化,却一直是相关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数的学者都同意,民族主义是一种自决的政治主张(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类集团可以被授予这种自决的权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宣称这种自决的权利,却一直是一个争辩中的问题。当试着重替民族主义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德国学者亚特就无奈地表示,‘在当今的政治分析的词汇当中,[民族主义]是最混淆的一个概念之一(Alter 1994, 1)’。凯克门诺必克也这样宣称,‘从来就没有两个作者——不论他们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民族主义’”。今天,民族在某些场合下也称国族,指的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联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或译国籍)认知和感情。”

如上所说,民族不仅有其客观特质,如肤色、语言、地域等;而且也有主观特质,也就是心理上的认同。

例如,台湾人是中国人本来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就像谁都不会怀疑湖南人是中国人这个简单的问题一样,作为大陆的中国人看待台独分子行为的问题上会相当奇怪: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居然有人有台独分子会说“中国猪,滚回去”这样的话呢?那不是在骂你自己吗?(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基本上会天然地不假思索地这么认为)这实际是一部分台湾人同胞的认同出现了问题所致。

其实随着李登辉上台,紧接着民进党主政,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思潮在有心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已经呈蔓延的趋势。台独分裂势力的迅速扩张和很多

台湾人的认同出现问题有直接关系。自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华民国在国际舞台失去了合法性,台湾民主浪潮逐渐兴起,“二二八”事件之后的“省籍矛盾”所隐藏的台湾意识也逐渐抬头,这使得台湾人的中国人意识遭到冲击。当认同出现了问题,我们原本以为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大问题。认同是强烈的主观愿望,是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是民族的主观特质的强烈表现。台湾学者,《想像的共同体》的译者吴叡人在其译后记的最后一段,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说道:“啊,是的,这是你出生的故土,你故乡的土地;你所要寻找的已经近了,你最终将会找到的。为着去找咱们的台湾。”^{[5]242}吴叡人这样的台湾本省学者发出的声音正是对归属感的呼唤。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对台湾的本土意识不再一味否定,而已经开始抱着一种理性的精神态度对待这一复杂的现象。

当然,如果本土意识被扭曲为台独思想,任凭台独思想泛滥会导致海峡两岸局势持续紧张,危及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问题自然很严重。台湾海峡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一度剑拔弩张,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不能否认,此后八年的紧张关系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影子,尤其是“民族建构”思想。

既然认同是可以建构起来的,那么建构成什么样的认同,作为主体的社会成员所受的怎样的教育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上台后拼命“去中国化”,而马英九主政后则力主“去台独化”有所改正。马英九的主张当然在客观上能保证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免遭政治冲突而引发的战争的破坏。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此话不差,否则何以如中国人口如此众多的这样一个国度,方言差异几近欧洲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却有着相同的中国人认同观念?杜赞其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像了^{[6]17}。当然,近代西方列强的强烈冲击应该是作为具有国际观念的中华民族意识产生并扩散的根本原因。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民族主义(无论属于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6]。而经过近代百年中西方的强力碰撞,尤其经过同日本的两次战争使中华民族逐渐凝聚;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反侵略,中国人民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一过程,通过政府和爱国者的反复宣传、从城市向乡村不断扩散,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对这一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我们是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观念和观念被彻底建构起

来并深入人心了。至少是从自在的中华民族成为了自觉的中华民族^{[7]91}。

就台湾问题而言,对于两岸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政府来说,加强两岸交流,这对增进台湾人民属于中华民族,台湾人是中国人的观念,增进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认同至关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考虑孙中山是否能成为增进两岸人民相互认同的一座桥梁。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否可以成为两岸同属一体的象征。假如孙中山做不了这样的象征吧?那他的三民主义呢?尤其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呢?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近代国家主义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反复强调汉族的同化力很强,华夏文明优越,一方面认为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不自觉地将民族和国家等同起来,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2]405}。

孙中山有着强烈的意识汉族就是中国华民族的意识。在他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只英国有这种民族,就是美国也有很多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在外国便不能说民族就是国族。……而就中国的民族来说,总数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2]408}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听到这样的话是很不爽的,会感到被严重轻视。

在孙中山看来,这“文明教化有着四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却“没有民族的精神”,“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却实在是一片散沙。”^{[2]409}没有民族精神,也就是没有我们是一个大团体的共同体意识,因此是一片散沙。虽然都是一个一个相似的马铃薯,却相互分离,互不相干。当然孙中山可能不知道,没有战斗力的一口袋马铃薯对于本国统治者来说很有利,方便他们统治和管理。在孙中山的名言“中国人实在是一片散沙”的表述里,可以感觉到孙中山对很多中国人的中国人意识太弱而痛心疾首。其实从孙中山的话中可推出,中国人当时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小共同体意识,而没有中华民族的大共同体意识。团体精神是有的,但就中华民族这个层次而言,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团体精神。正因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精神,面对外敌侵略就一节一节败退,直到亡国灭种。

可以发现,孙中山讲的正是民族得以维系和存在的一个根本特质——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认同。

这个民族的主观特质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人来说确实不是很强,但相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而言,孙中山讲话那个时候已经好多了。不过1924年的中国仍然是军阀混战,四处割据,国家处于实质的分裂当中,并非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都已觉醒。只有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伟大的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主观特质——民族意识的自觉,群体的自我认同才开始逐渐熟透,并经过近代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而深入人心^{[6]313}。经过抗日战争期间的强烈“建构”,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爱国歌曲的广为传播,经过爱国志士如一二九运动当中的大学生的激情宣传,经过政府的不断动员(如蒋介石庐山谈话),中华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大众化的群体的自我认同彻底确立。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人的团体精神”——民族主义精神,我是“勇敢的中国人”的心理确立了下来。

孙中山在讲到民族的起源的时候,说到了五个造成“种种民族”的原因,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2]409}。其实他是在说民族间的差异何以存在,即为什么全世界存在那么多种族、民族种类。按照他的意思,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不同所导致。在他讲到的这些“原因”里,除了血统(他的意思大概是肤色)之外,剩下的四种“原因”都可以划归到人类的文化习俗里去,也就是说民族间的差异由很多文化因素造成的。我们往往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的差异中辨别我群和他群。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是一种历史社会现象,民族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使我们发展出民族这个概念,正是需要解释的对象。

在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说因为我们在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上不同,所以新疆人和西藏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就中华民族这个层次而言,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民族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实际,正因为肤色、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的不同使我们这些以分类方法认识世界、区分你我的高级生物产生疑惑,何以“我们”和“你们”在肤色、语言、宗教、生活、风俗习惯上不同?导致某种群体自称属于同一民族的根本缘由是什么?

按照孙中山的理解,那些文化因素属于自然力,而且民族是早于国家而存在的。有民族未必就有国家,国家亡了,而民族却可以存在,比如印度。印度虽然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印度诸多民族却并没有消失^{[2]406}。这是有道理的,典型的例子就是

犹太人亡国两千年之后,犹太人依然存在,没有被同化掉,并成功复国。

这样说来,是由于民族的客观特质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延续。但是问题又来了,古老的中国人难道在客观特质上一直一样吗?很多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吃西餐、讲英语、信基督教,但却自认为是中国人,这又是什么道理?中国的少数民族自称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又如何解释?答案是,客观特质变了,心理、感情这些主观特质依然存在。这是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用主观特质来解释当今复杂的民族现象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海外华人认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例子。

孙中山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2]409}在解释中国何以如此时,孙中山的解释是中国人(汉人)在被满族人征服后逐渐丢掉了民族主义精神,尤其是保存在卑鄙的下流社会(如洪门会党)中的拿口头来传的民族主义被人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就真是老早亡了,中国就衰落了^{[2]436}。孙中山的意思是汉族人的作为汉族人的民族意识曾经存在过,后来经过康熙开“博学鸿词科”而逐渐丢掉了,至少是从文字中消失了。很明显,孙中山是将中国人等同于汉族人的。姑且不论1924年中山先生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民族”的观点与事实相背离,就中国古代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很强来说,我们不紧禁要反问,纵观明清两朝交替的过程,为满洲贵族打头阵的有多少汉族人呢?而宋元崖门海战蒙古人又有几个?

就民族的特质而言,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也是现代待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不能忽视的两个方面。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已经很好地从政治特性和文化特性两个角度对民族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存在两种民族模式:一是西欧的,一是东欧和亚洲的。前者强调社会行为和政治性,这种模式的组成部分有:A、历史形成的领土,B、法律和政治共同体,C、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D、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后者强调血统和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之类),这种模式的组成部分由:A、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领土,B、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C、对本土的文化的重视超过法律^{[7]147}。将中华民族对照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比较特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稳定下来,中国人的中国人意识强化下来,有中国历史的“雪球”因素,就是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越滚越大,逐

渐形成,而西方的冲击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模式不好归类,因为她实在特殊,中国既是个古老的传统国家,又有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特征。中华民族似乎很古老,却又很现代。她既重视领土观念,又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在中国人身上我们好像可以找到美国以及已经消失了的苏联等众多国家和民族的种种特点。但是中国就是中国,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也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述,西方列强的冲击,尤其是八年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状态进入到了“自觉”的状态。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群体和身份认同。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思想也是“我群”和“他群”相区别的群体和身份认同。现在有很多学者相信民族和国家联系起来是近代的事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近代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则说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民族的定义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关于什么是民族和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相关内容应该是什么,在历史上又曾经有过什么变化,却一直是相关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数的学者都同意,民族主义是一种自决的政治主张(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集团可以被授与这种自决的权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宣称这种自决的权利,却一直是一个争辩中的问题。当试着要替民族主义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德国学者亚特就无奈地表示,‘在当今的政治分析的词汇当中,[民族主义]是最混淆的一个概念之一’(Alter 1994, 1)’。凯克门诺必克也这样宣称,‘从来没有两个作者——不论他们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民族主义’。”“今天,民族在某些场合下也称国族,指的是一群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联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或译国籍)的认知和感情。”^[44]

如上所说,民族不仅有其客观特质,如肤色、语言、地域等;而且也有主观特质,也就是心理上的认同。

例如,台湾人是中国人本来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就像谁都不会怀疑湖南人是中国人这个简单的问题一样,作为大陆的中国人看待台独分子行为的问

题上会相当奇怪: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居然有台独分子会说“中国猪,滚回去”这样的话呢?那不是骂你自己吗?(大部分中国人基本上会天然地不假思索地这么认为)这实际是一部分台湾人的认同出现了问题所致。

其实随着李登辉上台,紧接着民进党主政,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思潮在有心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已经蔓延的趋势。台独分裂势力的迅速扩张和很多台湾人的认同出现问题有直接关系。自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华民国在国际舞台失去了合法性,台湾民主浪潮逐渐兴起,“三三三”事件之后的“省籍矛盾”所隐藏的台湾意识也逐渐抬头,这使得台湾人的中国人意识遭到冲击。当认同出现了问题,我们原本以为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大问题。认同是强烈的主观愿望,是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是民族的主观特质的强烈表现。台湾学者,《想象的共同体》的译者吴叡人在其译后记的最后一段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说道:“啊,是的,这是你出生的故土,你故乡的土地;你所要寻找的已经很近了,你最终将会找到的。为着去找咱们的台湾。”^[42]吴叡人这样的台湾本省学者发出的声音正是对归属感的呼唤。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对台湾的本土意识不再一味否定,而已经开始抱着一种理性的精神对待这一复杂的现象。

当然,如果本土意识被扭曲为台独思想,任凭台独思想泛滥会导致海峡两岸局势持续紧张,危及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问题自然很严重。台湾海峡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一度剑拔弩张,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不能否认,此后八年的紧张关系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影子,尤其是“民族建构”思想。

既然认同是可以建构起来的。那么建构成什么样的认同,作为主体的社会成员所受的怎样的教育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上台后拼命“去中国化”,而马英九主政后则力主“去台独化”。马英九的主张当然在客观上能保证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免遭政治冲突而引发的战争的破坏。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此话不差,否则何以如中国人口如此众多的这样一个国度,方言差异几近欧洲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却有着相同的中国人认同观念?杜赞其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43]当然,近代西方列强的强烈冲击应该是作为具有国际观念的中华民族意识产生并扩散的根本原因。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民族主义(无论属于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

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44]而经过近代百年中西方的强力碰撞,尤其经过同日本的两次战争使中华民族逐渐凝;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反侵略,中国人民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一过程,通过政府和爱国者的反复宣传,从城市向乡村不断扩散,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对这一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我们是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 and 观念被彻底建构起来并深入人心了。至少是从自在的中华民族成为了自觉的中华民族。^[45]

就台湾问题而言,对于两岸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政府来说,加强两岸交流,这对增进台湾人民属于中华民族,台湾人是中国人的观念,增进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认同至关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考虑孙中山是否能成为增进两岸人民相互认同的一座桥梁。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否可以成为两岸同属一体的象征。假如孙中山做不了这样的象征吧?那他的三民主义呢?尤其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呢?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近代国家主义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反复强调汉族的同化力很强,华夏文明优越,一方面认为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不自觉地将民族和国家等同起来,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46]

孙中山有着强烈的汉族就是中国民族的意识。在他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英国有这种民族,就是美国也有很多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在外国便不能说民族就是国族。……而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四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一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47]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听到这样的话是很不爽的,会感到被严重轻视。

在孙中山看来,这“文明教化有着四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却“没有民族的精神”,“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却实在是一片散沙。”^[48]没有民族精神,也就是没有我们是一个大团体的共同体意识,因此是一片散沙。虽然都是一个一个相似的马铃薯,却相互分离,互不相干。当然孙中山可能不知道,没有战斗力的一口袋马铃薯对于本国统治者来说很有利,方便他们统治和管理。在孙中山的名言“中国人实在是一片散沙”的表述里,可以感觉到孙中山对很多中国人的中国人意识太弱痛心疾首。其实从孙中山的话可

推出,中国人当时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小共同体意识,而没有中华民族的大共同体意识。团体精神是有的,但就中华民族这个层次而言,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团体精神。正因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精神,面对外敌侵略就一直节节败退,直到亡国灭种。

可以发现,孙中山讲的正是民族得以维系和存在的一个根本特质——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认同。

这个民族的主观特质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人来说确实不是很强,但相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而言,孙中山讲话那个时候已经好多了。不过1924年的中国仍然是军阀混战,四处割据,国家处于实质的分裂当中,并非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都已觉醒。只有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伟大的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主观特质——民族意识的自觉,群体的自我认同才开始逐渐熟透,并经过近代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而深入人心。^[10]经过抗日战争期间的强烈“建构”,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爱国歌曲的广为传播,经过爱国志士如一二九运动当中的大学生的激情宣传,经过政府的不断动员(如蒋介石庐山谈话),中华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大众化的群体的自我认同彻底确立。孙中山所说的“中国人的团体精神”,民族主义精神,我是“勇敢的中国人”的心理确立下来了。

孙中山在讲到民族的起源的时候,说到了五个造成“种种民族”的原因,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20]其实他是在说民族间的差异何以存在,即为什么全世界存在那么多种族、民族种类。按照他的意思,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不同所导致。在他讲到的这些“原因”里,除了血统(他的意思大概是肤色)之外,剩下的四种“原因”都可以划归到人类的文化习俗里去,也就是说民族间的差异由很多文化因素造成的。我们往往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的差异中辨别我群和他群。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是一种历史社会现象,民族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本身就是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使我们发展出民族这个概念,正是需要解释的对象。

在今天,我们可不可可以说因为我们在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上不同,所以新疆人和西藏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就中华民族这个层次而言,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民族包括中国所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实际,正因为肤色、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的不同使我们这些以分类方法认识

世界,区分你我的高级生物产生疑惑,何以“我们”和“你们”在肤色、语言、宗教、生活、风俗习惯不同?导致某种群体自称属于同一民族的根本缘由是什么?

按照孙中山的理解,那些文化因素属于自然力,而且民族是早于国家而存在的。有民族未必就有国家,国家亡了,而民族却可以存在,比如印度。印度虽然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印度诸多民族却并没有消失。^[21]这是有道理的,典型的例子就是犹太人亡国两千年之后,犹太人依然存在,没有被同化掉,并成功复国。

这样说来,是由于民族的客观特质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延续。但是问题又来了,古老的中国人难道在客观特质上一直一样吗?很多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吃西餐、讲英语、信基督教,但却自认为是中国人,这又是什么道理?中国的少数民族自称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又如何解释?答案是,客观特质变了,心理、感情这些主观特质依然存在。这是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用主观特质来解释当今复杂的民族现象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海外华人认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例子。

孙中山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22]在解释中国何以如此时,孙中山的解释是中国人(汉人)在被满族人征服后逐渐丢掉了民族主义精神,尤其是保存在卑鄙的下流社会(如洪门会党)中的拿口头来传的的民族主义被人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就真是老早亡了,中国就衰落了。^[23]孙中山的意思是汉族人的作为汉族人的民族意识曾经存在过,后来经过康熙开“博学鸿词科”而逐渐丢掉了,至少是从文字中消失了。很明显,孙中山是将中国人等同汉族人的。姑且不论1924年中山先生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民族”的观点与事实相背离,就中国古代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很强,我们不禁要反问,纵观明清王朝交替的过程,为满洲贵族打头阵的有多少汉族人呢?而宋元崖门海战蒙古人又有几个?

就民族的特质而言,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也是现代待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不能忽视的两个方面。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已经很好的从政治特性和文化特性两个角度对民族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存在两种民族模式。一是西欧的,一是东欧和亚洲的。前者强调社会行和政治性,这种模式的组成部分有:A、历史形成的领土,B、法律和政治共同体,C、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D、

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后者强调血统和和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之类),这种模式的组成部分由:A、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领土,B、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C、对本土的文化的重视超过法律。^[24]将中华民族对照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比较特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稳定下来,中国人的中国人意识强化下来,有中国历史的“雪球”因素,就是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越滚越大,逐渐形成,而西方的冲击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模式不好归类,因为她实在特殊,中国既是个古老的传统国家,又有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特征。中华民族似乎很古老,有很现代。她即重视领土观念,又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在中国身上我们好像可以找到美国以及已经消失了的苏联等众多国家和民族的种种特点。但是中国就是中国,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三、国族主义思想与公民社会的建立

如果能使孙中山国族主义理论和现代公民社会有机地相联结,凭借孙中山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和象征意义,我们应该可以创造出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当然如何有机地联结,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并能很好地挖掘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和我们这个时代相合拍的要素,并予以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要素当中,国族主义思想值得一试。

20世纪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社会巨变,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按照亨廷顿的民主三波论的说法来看^[8],东欧剧变应该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巨浪了。这个巨浪的后果就是,世界一下子就多出了十几个新国家。而巨变过程和随之带来的不仅是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化,还有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民族问题。种族屠杀和民族冲突成为20世纪90年代最热点的问题。甚至在今天,苏联裂变近20年后,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问题依然严峻。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刚刚开始,就传来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息。毫无疑问,这是亨廷顿所谓民主浪潮带来的民族问题高加索地区余波难了的表现,是苏联裂变之后民族问题的延续。苏东巨变,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如同晴天霹雳,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解体,生活在那里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之间的“种族清洗”和冲突便接踵而至;而从苏联解体之后分化出来的中亚诸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等国家围绕边界发生的冲突,内部民族因劳动力过剩引发的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三股势力”问题(所谓“三股势力”是指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一直让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思考:民主社会的建构一定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仅以塔吉克斯坦内战6万多人丧生,80余万人流离失所为例,如果民主社会的建立以这样的损失为代价,以社会的持续震荡和民族间的经年不断的冲突作为条件,这在今天人类理性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实在是太大了。人类理应有智慧来解决秩序和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苏东巨变之后的民族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一亿少数民族的既传统又现代的的国家而言,不啻是一个极好的前车之鉴。

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与民主化相伴的民族问题成为制约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也就是如何避免苏联、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民主化模式——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严重的民族流血冲突、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这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个严峻的课题。中国拥有超过一亿人口的少数民族;在西部地区,民族问题是否能妥善处理关乎当地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关乎整个中国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同政治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学者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是以政治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化改革不会挑动民族分裂的神经,民族问题不会因为政治改革而衍生出来,或者放大、激化,力图避免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内乱情形的出现。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发展不应导致民族问题的出现或恶化。

要达到上述目标,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主义理论,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至关重要。

我们国家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这样的制度对解决民族关系、国家稳定是比较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得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族关系达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各民族人民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这种民族政策也带来子的不良后果也逐渐显现,尤其区分民族类别,人为比如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分校制度,将不同民族的学生分在不同的学校进行教育,强化了整体中华民族社会成员的隔阂。不但不利于社会成员的总体进步,反而造成社会成员的隔离。世界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在消除隔离,而我们却在一定的程度“加强”“隔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

带格式的: 行距: 最小值 15.15 磅

的一些民族宣传,民族政策就是在贴标签,人为地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拉大,人为地造成差别,人为地制造裂痕。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敞开,中国的民族问题也越来越显现。经常出现在媒体之上的“东突”、“藏独”,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言已经不再是陌生的词语了,再加上“台独”,我们会发现威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民族问题似乎越来越多了。这里面或许有媒体放大的效果,但发生在2008年的拉萨事件、新疆的恐怖劫机事件又告诉我国民族地区的问题相当严重,中国政府就是为了当下民族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要对过往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进行检讨,同时还要提出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新的民族理论,制定新的民族政策。

因为以往的民族政策虽然能解决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新问题也因此而诞生;因为有东欧剧变之后民族屠杀的惨痛教训,对已经处在新时代的中国政府而言,不管是防微杜渐抑或未雨绸缪,采用适应新时代的民族主义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吸收先进经验,制定新的民族政策,都是势在必行的。

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里,我们能够挖掘到适应现实社会的思想。如果将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建构理论里的糟粕去掉,比如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思想、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至少是忽视)等等,而将国族团体思想赋予现代公民社会团体的意义,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强调全国56个民族同属一家人,处理好中华民族同汉族、蒙族、藏族、维族、彝族等“民族团体”之间的层次关系,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民族问题就容易解决。

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国体出现了问题。苏联实行加盟共和国制度,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虽然人为地制造(建构)“苏联民族”,但是这个称谓又和它的国体相矛盾,而且“苏联民族”的建构过程是大俄罗斯主义的扩张,引发其他民族的不满和怨恨^[9];前南斯拉夫全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和马其顿6个共和国组成,也没有一个叫做南斯拉夫民族的称谓;这为它们裂解成多个国家留下了隐患。而美国则绝没有这样的问题。固然美利坚民族的称谓似乎不甚科学,美国人自己也不太使用,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美国意识非常强烈却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建国的200多年是美利坚社会成员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建构过程。苏联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利坚民族是经过公民社

会的建构而建构起来的,而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斯大林模式的,以及克格勃特务统治注定苏联各个全民族难以融合到一起。

中华民族的确立虽然在近代才实现,但她有古老的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游牧民族集团和农耕民族集团的汇合中就已经显露端倪了^[10]。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制度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同样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不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出现。这正是中国社会民主进程中面对民族分裂势力非常有利的一点。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改造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建构理论,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可以实现得了的。

孙中山提倡国族主义思想是针对中国人的在国家团体层次上集体意识不强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强,孙中山有过分析,说中国人(指汉族人)以前有,后来丢掉了^{[2]436}。其实上文已经分析过,真正的中华民族意识是经过伟大的抗日战争而彻底确立下来的。如果说中国以前有民族主义,那应该是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所说的,以前有,后来丢掉了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汉族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元末宋濂为朱元璋草拟的讨元檄文里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如果将国族主义对等为汉族主义,那么这将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极为不利。但是国族团体涵盖中国56个民族的所有成员,每个成员不分信仰、宗教,都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那么中华民族也将会和美利坚民族一样坚不可摧,不用担心民族分裂这样的事情会对中国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发生。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处理好中华民族同汉族、蒙族、藏族、维族、彝族等“民族团体”之间的层次关系就是关键。

就如孙中山1919年《三民主义》未刊稿里所讲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2]615},避免大汉族主义是非常关键的。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盎格鲁撒克逊化是不成功的,“合为一炉而冶之”未必就能实现,也未必就是好的方法。真正能让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各族群成员和睦相处的办法是公民社会体制下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中国,就是“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国族团体”,各“民族团体”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发展。

如果我们把孙中山的国族团体理解为公民团体,即中华民族是一个超级大的公民团体,强调各

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非对某民族、某文化刻意制造,那么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将容易解决。相反,不在公民社会的建立上下功夫,而要搞所谓将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的“国教”,读所谓儒家经典这些名堂,那毫无疑问,民族分裂的危险只能加大,而不会减小。

当今各国,民族问题处理得好的国家,无不是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民族(族群),乃至种族最多的国家。在近3亿人口的国度里,不仅有白种人、黑种人、还有大量的黄种人。按道理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很难治理。但是公民本位的社会制度使他的多民族成为国家文化繁荣的一个推动力,而不是社会稳定的羁绊。但美国的民族政策是强调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而弱化民族肤色等方面的差异,防止民族歧视,比如不刻意强调某人属于哪一个民族或族群。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要借鉴学习。

中华民族同美利坚民族的层次应该是一样的。在一定的意义上,都不是“民族”,而是“国

族”。有了这样的认识,很多民族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如果能使孙中山国族主义理论和现代公民社会有机地相联结,凭借孙中山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和象征意义,我们可以创处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当然如何有机地联结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并能很好地挖掘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和我们这个时代相合拍的要素,并予以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要素当中,国族主义思想值得一试。

二十世纪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社会巨变,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按照亨廷顿的民主三波论的说法来看,^[26]东欧剧变应该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巨浪了。这个巨浪的后果就是,世界一下子就多出了十几个国家。而巨变过程和随之带来的不仅是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化,还有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民族问题。种族屠杀和民族冲突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热点的问题。甚至在今天,苏联裂变近20年后,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问题依然严峻。2008年北京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刚刚开始,就传来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息。毫无疑问,这是亨廷顿所谓民主浪潮带来的民族问题高加索地区余波难了的表现,是苏联裂变之后民族问题的延续。苏东巨变,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如同晴天霹雳,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解体,生活在那里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之间的“种族清洗”和冲突便接踵而至;而从苏联解体之后分出来的中亚诸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围绕边界发生的冲突,内部民族因劳动力过剩引发的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三股势力”问题(所谓“三股势力”是指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一直让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思考:民主社会的建构一定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仅以塔吉克斯坦内战死亡六万多人丧生,八十余万人流离失所为例,如果民主社会的建立以这样的损失为代价,以社会的持续震荡和民族间的经年不断的冲突作为条件,这在今天人类理性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实在是太大了。人类理应有智慧来解决秩序和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苏东巨变之后的民族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一亿少数民族民族的即传统又现代的的国家而言,不啻是一个极好的前车之鉴。

中国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与民主化相伴的民族问题成为制约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也就是如何避免苏联、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民主化模式——这些国家无一例

带格式的: 缩进: 首行缩进: 0 字符

外地出现严重的民族流血冲突,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个严峻的课题。中国拥有超过一亿人口的少数民族,在西部地区,民族问题是否能妥善处理关乎当地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关乎整个中国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同政治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学者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是以政治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化改革不会挑动民族分裂的神经,民族问题不会因为政治改革而衍生出来,或者放大激化,力图避免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内乱情形的出现。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发展不应导致民族问题的出现或恶化。

要达到上述目标,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主义理论,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至关重要。

我们国家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这样的制度对解决民族关系、国家稳定是比较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得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族关系达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各民族人民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民族政策也带来了不良后果,比如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分校制度,将不同民族的学生分在不同的学校进行教育,强化了社会成员的隔阂,不但不利于社会成员的总体进步,反而造成社会成员的隔离。世界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在消除隔离,而我们却在一定的程度“加强”隔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一些民族宣传,民族政策就是在贴标签,人为地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拉大,人为地造成差别,人为地制造裂痕。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敞开,中国的民族问题也越来越显现。经常出现在媒体之上的“东突”、“藏独”,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言已经不再是陌生的词语了,再加上“台独”,我们会发现威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民族问题似乎越来越多了。这里面或许有媒体放大的效果,但发生在2008年的拉萨事件、新疆的恐怖劫机事件又告诉我国民族地区的问题相当严重,中国政府就是为了当下民族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要对过往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进行检讨,同时还要提出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新的民族理论,制定新的民族政策。

因为以往的民族政策虽然能解决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新问题也因此而诞生,因为有东欧剧变之后民族屠杀的惨痛教训。对已经处在新时代的中国政府而言,不管是防微杜渐抑或未雨绸缪,采用适应新时代的民族主义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吸收先进经验,制定新的民族政策,都是势在必行的。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里,我们能够挖掘到适应

现实社会的思想。如果将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建构理论里的糟粕去掉,比如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思想,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至少是忽视)等等,而将国族团体思想赋予现代公民社会团体的意义,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强调全国五十六个民族同属一家人,处理好中华民族同汉族、蒙族、藏族、维族、彝族等“民族团体”之间的层次关系,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民族问题就容易解决。

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国体出现了问题。苏联实行加盟共和国制度,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虽然人为地制造(建构)“苏联民族”,但是这个称谓又和它的国体相矛盾,而且“苏联民族”的建构过程是大俄罗斯主义的扩张,引发其他民族的不满和怨恨。^[26]前南斯拉夫全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和马其顿六个共和国组成,也没有一个叫做南斯拉夫民族的称谓;这为它们裂解成多个国家留下了隐患。而美国则绝没有这样的问题。固然美利坚民族的称谓似乎不甚科学,美国人自己也不太使用,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美国意识非常强烈却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是美利坚社会成员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建构过程。苏联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利坚民族是经过公民社会的建构而建构起来的,而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克格勃特务统治注定苏联各民族难以融合到一起。

中华民族的确立虽然在近代才实现,但她有古老的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游牧民族集团和农耕民族集团的汇合中就已经显露端倪了。^[27]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制度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同样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不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出现。这正是中国社会民主进程中面对民族分裂势力非常有利的一点。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改造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建构理论,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可以实现得了的。

孙中山提倡国族主义思想是针对中国人的在国家团体层次上集体意识不强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强,孙中山有过分析,说中国人(指汉族人)以前有,后来丢掉了。^[28]其实上文已经分析过,真正的中华民族意识是经过伟大的抗日战争而彻底确立下来的。如果说中国以前有民族主义,那应该是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所说的,以前有,后来丢掉了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汉族主义,

甚至可以说是元末宋濂为朱元璋草拟的讨元檄文里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如果将国族主义对等与汉族主义，那么这将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极为不利。但是国族团体涵盖中国整个56各民族的所有成员，每个成员不分信仰、宗教，都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那么中华民也将会和美利坚民族一样坚不可摧，不用担心民族分裂这样的事情会对中国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处理好中华民族同汉族、蒙古族、藏族、维族、彝族等“民族团体”之间的层次关系就是关键。

就如孙中山1919年《三民主义》未刊稿里所讲：“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29]避免大汉族主义是非常关键的。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盎格鲁撒克逊化是不成功的，“合为一炉而冶之”未必就能实现，也未必就是好的方法。真正能让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各族群成员和睦相处的办法是公民社会体制下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中国，就是“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国族团体”，各“民族团体”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发展。

如果我们把孙中山的国族团体理解为公民团体，即中华民族是一个超级大的公民团体，强调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非对某民族、某文化刻意制造，那么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将容易解决。相反，不在公民社会的建立上下功夫，而要搞所谓将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的“国教”，读所谓儒家经典这些名堂，那毫无疑问，民族分裂的危险只能加大，而不会减小。

当今各国，民族问题处理得好的国家，无不是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民族（族群），乃至种族最多的国家。在近3亿人口的国度里，不仅有白种人、黑种人、还有大量的黄种人。按道理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很难治理。但是公民本位的社会制度使他的多民族成为国家文化繁荣的一个推动力，而不是社会稳定的羁绊。美国的民族政策是强调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而弱化民族肤色等方面的差异，防止民族歧视，比如不刻意强调某人属于哪一个民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要借鉴学习。

中华民族同美利坚民族的层次应该是一样的。在一定的意义上，都不是“民族”，而是“国族”。有了这样的认识，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参考文献

- [1] 史扶邻.《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孙中山》, [M], 240页,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 [2]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M], 上册468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3] 黄彦编.《孙文选集》, 中册615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4]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06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5]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10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6]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05—406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37] 刘乃强.《“国族”认同下的民族主义[N].《南风窗》, 2008—5—13(—10).
- [8]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69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9] 《辞海》: 922页、2477页,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缩印本.
- [410]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 《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M]//斯大林全集4943,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 [11] 维基百科, “民族”词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
- [54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 242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
- [1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17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
- [64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M], 344页,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4.
- [745]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 91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1, 3.
- [16]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05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17]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08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18] 黄彦.《孙文选集》上册409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19]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313页, 北京, 三联书店1995, 4.
- [20]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09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21]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06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22]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09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23]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436页, 广州, 广东人民

出版社, 2006。

[24]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 147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1。

[825]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M], 21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926] 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 [M], 50页, 51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027]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M]》, 33页,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28] 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第426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29] 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615页,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明清之际的李渔不仅在文学领域成就卓著, 而且在园林建造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 他都极其出色, 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造园大家。他在《闲情偶寄·居室部》“房舍第一”中非常自豪地说, “生平有两绝技”, 其中之一就是“置造园亭”^[2]。从实际情况来看, 李渔并非自吹自擂, 而是名副其实。据记载, 李渔亲自为自己建造设计了几座园林。“伊园”即所谓的“伊山别业”, 是李渔试图效法唐人王维在老家兰溪所建的一座园林。“伊园”原址只是一座小山丘。李渔在《卖山券》中说:“高才三十余丈, 广不溢百亩, 无寿松美箭、诡石飞瀑足娱悦耳目, 不过以在吾族即离之间, 遂买而家焉。”^{[11]29-241}按理说, 这样一个不毛之地根本不适合建造园林。但是, 经过李渔的精心设计, “伊园”独具匠心, 别具一格。他在《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中对“伊山别业”的特点、格局、景观以及审美价值做了生动地描述, 组诗中的第三首云:“南轩向暖北轩凉, 宜夏宜冬此一方。栽遍竹梅风冷淡, 浇肥蔬蕨饭家常。窗临水曲琴书润, 人读花间字句香。诗债十年酬未始, 拟从今日备奚囊。”^{[11]66}不难看出, 出自李渔之手的“伊山别业”不仅非常适宜人居住, 而且还具有浓郁的艺术氛围, 堪称实用与审美二者完美地契合, 是典型的诗意栖居之所。顺治十八载, 李渔举家移居金陵。他历时八载, 在明代遗老云集的秦淮河畔自建了著名的园林——“芥子园”。《西湖新志·人物篇》在李渔的条目中有这样的记载:“筑芥子园于铁冶岭上, 凡门扇、窗牖、扁额、对联, 皆独出新意。即起居服用之物, 亦多异常。”^[12]李渔在《芥子园杂联》序中也说:“此余金陵别业也, 地止一丘, 故名芥子, 状其微也。往来诸公, 见其稍具丘壑, 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 其然岂其然乎?”^{[11]29-241}芥子园虽小, 但能“纳须弥”, 园内各种景致一应俱全, 别有一番风味。“层园”是李渔晚年在杭州时将自己所购买的一所旧宅改造而成的。他在《次韵和张壺阳

观察题层园十首》序中云:“予自金陵归湖上, 买山而隐, 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 不知起几十级也。”^{[11]246}层园因地制宜, 倚山而建, 自低至高, 顺着山势, 步步升高, 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 所以取名为“层园”。据《金华诗录》记载:“笠翁自白门移居杭州, 居湖上, 碧波翠岚, 环映几席, 自喜与山水为邻, 题柱云:‘繁冗驱人, 旧业尽抛尘市里; 湖山招我, 全家移入画图巾。’”^[13]层园设计独特, 立意新颖, 当然是中国古典园林建造的成功佳作。除自建园林之外, 李渔出于谋生或者奉承缙绅的缘故, 擅于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他人建造园林。他曾经自告奋勇, 毛遂自荐, 帮助龚芝麓修建了绿野堂。他在《大宗伯龚芝麓先生书来有将购市隐园与予结邻之约, 喜成四绝奉寄, 以速其成》云:“闻说将开绿野堂, 可容老圃见微长。满怀丘壑无由出, 愿与裴公作嫁裳。”^{[11]69}另据史料记载, 李渔在游历京师时, 还帮助当时的权贵修建了若干座园林。据传北京的惠园出自李渔之手。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有明确的记载:“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 引池叠石, 饶有幽致, 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14]北京的半亩园也是李渔亲自替人设计修建而成的。清代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半亩营园”中说:“半亩园, 在京都紫禁城外东北隅, 弓弦胡同内, 延禧观对过。园本贾胶侯中丞宅, 李笠翁客贾幕时, 为葺斯园。”又说“半亩园以石胜, 缘出李笠翁手, 故名。”^[15]总的来说, 李渔设计建造的园林很可能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 只是由于岁月沧桑, 文献资料的散逸, 他亲自设计建造园林的具体数量我们已经无法具体考证了。

由于拥有长期的造园实践, 李渔逐渐积累了丰富的造园经验。但是, 李渔的造园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 而是将这种经验作了一定程度的提炼和概括, 使之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水准。他的造园思想在理论上的升华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闲情偶寄》之中。在仔细深入考察《闲情偶寄》之后, 笔者认为: 李渔的艺术素养、艺术个性乃至艺术审美理想对他的造园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园林居室的布置上, 李渔习惯用字画等艺术品来直接装饰美化居室。这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表现得极其明显。在“置顶格”中, 李渔为了节约空间, 美化空间, 别出心裁, 将顶格做成四面低、中间高, 类似斗笠的形状。即使在顶和四周之间保有一尺多的狭小竖板上, 李渔也要在上面装裱字画。在“取景在借”中, 李渔巧妙地制作了“尺幅窗”。他认为, 此窗虽然多半是开着的, 但是也有关闭的

时候。关闭的时候“用他榻他榻”，“与画意不合”。为了避免“丑态”，他依照原来式样的大小，“作木榻一扇”，裱上一幅名画，直接将其嵌入窗中，“又是一幅真画”。他还强调，裱木榻要用麻布和后纸，不能太薄，薄则透明有光，“不成画矣”。李渔考虑之周全，手法之细腻，可见一斑。在“书房壁”中，李渔认为，“壁间书画自不可少”，但是，要掌握好度，不能贴得太多，否则，适得其反。“然粘帖太繁，不留余地，亦是文人俗态”。然而，李渔认为，“裱榻不如实贴”，轴怕风吹动损伤名迹，实贴倒是无此患，而且大小还很合适，“实贴又不如实画”，实画则是一件韵事。在“厅壁”中，他认为，“厅壁不宜太素，亦忌太华。名人尺幅自不可少，但须浓淡得宜，错落有致。”于是，李渔聘请高手在“厅壁”上作画。“乃于厅旁四壁，倩四名手，尽写着着色花树，而绕以云烟，即以所爱禽鸟，蓄于虬枝老干之上。”“画止空迹，鸟有实形”，“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良朋至此，仰观壁画，忽见枝头鸟动，叶低翎张，无不色变神飞，诧为仙笔，乃惊疑未定，又复载飞载鸣，似欲翱翔而下矣。谛观熟视，方知个里情形，有不抵掌叫绝，而称为巧夺天工者乎？”李渔标新立异的园林居室美化方法，立刻产生了奇妙的审美效果。“因禽鸟之善鸣善啄，觉花树之亦动亦摇，流水不鸣而似鸣，一高山是寂而非寂。”李渔自己也相当自负地说：“座客别去者，皆作殷浩书空，谓咄咄怪事，无有过此者矣。”

李渔认为：“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所谓“同一致”，实际上是指二者在技巧上是相通的，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渔在阐述自己的造园思想时总是习惯以作文和绘画为例，巧妙地运用作文和绘画与造园之间在技巧上的一致性，生动形象地阐明他的造园理论。在《闲情偶寄·居室部》“房舍第一”中，李渔针对当时人们在营造房舍时与主人身份不对称的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夫房舍与人，欲其相称。画山水者有诀云：‘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使一丈之山，缀以二尺三寸之树；一寸之马，跨以似马似粟之人，称乎？不称乎？”在李渔看来，房舍的高矮宽窄应该与它的主人地位相称。在这一点上，非常类似于绘画的要素布局技巧。当然，具体合适与否，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地位显赫者如商汤、周文王那样，身材魁梧，“高数仞为宜”。否则，如果堂屋的主人没有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地位，而且身材矮小，那么堂愈高则人愈觉得矮小，堂愈宽而人愈觉得瘦弱。在这里，李渔借用绘画要素布局技巧来说明房

舍高矮宽窄设计要求，既形象又通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闲情偶寄·居室部·山石第五》“大山”中，李渔还用作文绘画的技巧来比附说明营造假山的技巧。他说：“予遨游一生，遍览名园，从未见有盈亩累丈之山，能无补缀穿凿之痕。遥望与真山无异者。犹之文章一道，结构全体难，敷陈零段易。”在李渔看来，营造假山，小的比较容易，大的就很难使其“无补缀穿凿之痕”，主要是难在其框架布局，这一点非常类似于作文绘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之所以被称为名作，首先在于它先有成局，以气魄胜人，其次才是“修饰词华”。所以，要成功地堆砌好比较大的假山，最重要的是先要有一个整体框架，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再精雕细刻。这样堆砌的假山，无论是粗览还是细观，都不容易看出人工痕迹，而且还有“天然委曲之妙”。“混假出于真山之中，使人不能辨者，其法莫妙于此”。相反，“若夫间架未立，才笔自生，由前幅而生中幅，由中幅而生后幅，是谓以文作文，亦是水到渠成之妙境；然但可近视，不耐远观，远观则褻褻缝纫之痕出矣。”进一步地，李渔还用书画整体结构气魄胜人的道理来说明整体结构的重要性。他说，“名流墨迹，悬在中堂，隔寻丈而观之”。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仔细分辨具体的山水、亭台树木和字迹笔画，但是，“只览全幅规模，便足令人称许。何也？气魄胜人，而全体章法之不谬也。”因此，堆砌假山，尤其是堆砌“盈亩累丈”的假山，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事先是否具有整体的结构布局。在这一点上它与作文和绘画是一致的。

李渔虽然经常在作文和绘画与造园之间作类比，强调它们在技巧上的一致性，但是他绝没有将其混为一谈。对此，李渔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叠山磊石与作文绘画虽然在技巧上有一致性，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即使是那些丘壑填胸、烟云绕笔的绘画高手，在斋头片石面前，也会“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因此，即使是才高八斗工手绘画之人，也不一定擅长叠山磊石。由此可见，李渔不仅能够认识到造园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深得其精髓，而且还认识到二者的区别，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造园之理，与一切艺术，无不息息相通。故余曾谓明代之园林，与当时之文学、艺术、戏曲，同一思想感情，而以不同形式出现之。”^[6]正是深刻地领悟到了造园与艺术之间的内在相同性，李渔在造园时明确地提出了造园者的主体性问题，强调园林的写意功能。在《闲情偶寄·居室部》“山石第五”中，李渔很精辟地指出：“然造物鬼神之技，亦有工

拙雅俗之分,以主人之去取为去取。主人雅而喜工,则工且雅者致矣;主人俗而容拙,则拙而俗者来矣。有费累万金钱,而使山不成山、石不成石者,亦是造物鬼神作祟,为之摹神写像,以肖其为人也。一花一石,位置得宜,主人神情已见乎此矣。”园林雅俗与园林的设计者关系极为密切。这里所说的“主人”,亦如明代计成在《园冶》中所指“能主之人”^[9],即主持造园事宜的造园家。李渔深谙此理。在他看来,园林的雅俗、工拙全取决于“主人”,反过来又体现着“主人”的艺术趣味。园林中一花一石的设计,无不体现着主人的神情,无不是主人“意”的真实写照。园肖其人,恰似“文如其人”。李渔的见解与明代造园理论大家计成提出的“三分匠、七分主人”著名论断一脉相承,这可以看作是他对前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除了提出造园者的主体性问题,强调园林的写意功能之外,李渔还特别注重营造园林的艺术韵味。在《闲情偶寄》“途径”中,李渔指出:“径莫便手捷,而又莫妙于迂。”他设计的小径,“故作迂途”,“以取别致”,有曲径通幽之妙。在“取景在借”中,李渔巧妙地运用借景之法,制作便面之窗,巧妙借取窗外之景,打通了窗外与窗内的界限,立刻就产生了意境盎然的奇妙效果:“同一物也,同一事也,此窗未设以前,仅作事物观;一有此窗,则不烦指点,人人俱作图画观矣。”所谓“借景”,通俗地讲,就是将其他地方的景致纳入我们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借其他地方的景致来弥补和充实我们自己的视野。这种手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典艺术中的虚实相生理论,大体上可以认为它是虚实相生理论在造园实践上的体现。在“界墙”条中,李渔认为,界墙是家与家的分界线,也是家的外在轮廓。在具体的垒砌过程中,在审美上应该追求“萧疏雅淡之致”。在“小山”条中,李渔认为,堆砌假山,应当追求“透漏瘦三字”。所谓“透”,说的是假山之上的道路要有迂回曲折的韵味;所谓“漏”,说的是假山之上的石头四面玲珑,要有空灵的韵致;所谓“瘦”,说的是假山的堆砌要壁立当空,孤峙无倚,追求骨力,力争遒劲传神。在“石壁”条中,李渔认为,“壁后忌作平原,令人一览而尽。须有一物焉蔽之,使座客仰观不能穷其颠末,斯有万丈悬崖之势,而绝壁之名不虚矣。”假山石壁后面的景观设计,李渔主张要有“一物焉蔽之”,“忌作平原”。在这里,李渔的主张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亏蔽”问题。所谓“蔽”相当于遮隔,它可以阻挡人的视线,使之无法通过;“亏”则与之相反,是指视线未被遮蔽的透空之处。亏蔽就是指隔与不

隔,透与不透,藏与漏,二者的互映互补。在明清时期,这种手法在造园实践中运用得比较多。例如,沈德潜在《勺湖记》中说:“屋宇鳞密,市声喧杂,而勺湖之地,豁然清旷,初不知外此为阡陌者;而阡陌往来之人,不知中有木石水泉禽鱼之胜。”^[10]园内与园外,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如何形成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蔽隔”。《红楼梦》第十七回有这样一段话:“一面说,一面走,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11]通过贾政一行人,巧妙地展示了稻香村的亏蔽境界。青山斜阻,是青山的亏蔽,喷火蒸霞的杏花,是杏花的亏蔽。层层亏蔽,美景时隐时现,令人目不暇接。作为古代一种有效的营造园林意境、造成景深的重要造园手法,“亏蔽”虽在实践中运用比较普遍,但在李渔之前一直都缺少理论上的概括,即便计成的《园冶》也毫不例外。李渔首次将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造园经验上升为一个理论问题,并且做了相应的论述,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李渔谙熟“亏蔽”理论,这与他一贯重视营造园林艺术韵味的审美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知道,李渔在艺术上主张独创,反对窠臼。他在《闲情偶寄》“凡例七则”中明确地说:“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中,李渔明确主张戏剧创作要“脱窠臼”,他说,“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他不但强调每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特点,而且这种特点也要不断地变化。李渔针对戏剧创作拼凑、抄袭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吾观近日之新剧,非新剧也,皆老僧补之衲衣,医士合成之汤药。取众剧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种‘传奇’。但有耳所未闻之姓名,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李渔为了张扬自我,突出个性,还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一家言》,“《一家言》维何?余生平所为诗文及杂著也。近代名人著述皆以集名,乃余独异其辞者维何?曰: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摹仿!希冀于其中也。摹仿则比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势比千妍万态,以求免于拙;窃虑工多拙少之后,丧其为我矣。”^[12]

李渔主张独创、反对窠臼的艺术个性直接影响了他的造园思想。在他的造园思想中,李渔明确地

反对盲目地模仿抄袭,而是要求“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极力主张求新求变,以新奇为美,提出了所谓“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的看法。在《闲情偶寄·居室部》“房舍第一”中,李渔指出:“乃至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谗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在李渔生活的那个时代,一些“通侯贵戚”造园,不讲究独创性,而且以效仿名园为荣。有的事先就告诉大匠:“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主持造园的大匠也必以“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丝毫不谬”而居功。李渔断然否定了这种“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少有不合,不以为得,反以为耻”的错误观念。他以辛辣的口吻批评说:“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盛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立异之文人;下之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器器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卓哉!”李渔提倡的是“不拘成见”,“出自己裁”,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这种“出自己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闲情偶寄·器玩部·位置第二》“忌排偶”中说:“当行之法,则与时变化,就地权宜,视形体为纵横曲直,非可预得规模者也。”李渔反对“预得规模”,反对用这种统一的“规模”去生搬硬套所有的园林景物,从而造成千篇一律,呆板僵滞。二是从成法中变出,即出于成法而又不拘于成法。他在《闲情偶寄·居室部》“窗栏第二”中说:“吾观今世之人,能变古法为今制者,其惟窗栏二事乎?窗栏之制,日新月异,皆从成法中变法。”“不从法”并不意味着没有法,只是指不从成法而已。这就要求对待前人已有法度采取灵活的态度,用法而不被法用,这样才能有创造,有独见,才能做到尚奇求新的境界。

李渔并非空谈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很好地贯彻了他自己的理论主张。康熙十六年,李渔举家移居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设计建造了层园。据《西湖新志》记载,他的层园非常具有独创性。它的门扇、窗牖、扁额、对联,“皆独出新意”,即使是起

居日常生活用品,“亦多异常”。在《闲情偶寄·居室部》“窗栏第二”中,李渔擅长“变古法为今制”,设计制作出的窗棂多种多样,有“纵横格”、“斜欹格”、“屈曲格”等多种形式,其中尤以“屈曲格”中的“桃花浪”最富有新意。在《闲情偶寄·居室部》“取景在借”中,李渔设计的窗也是多种多样,有“便面窗”、“尺幅窗”、“梅窗”,不仅三种窗的制作方法不同,而且三种窗之间风格也迥异,绝不雷同。在《闲情偶寄·居室部》“联匾第四”中,他抨击了“一人为之,千人万人效之,自昔徂今,莫知稍变”的弊病,摒弃了“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的传统观念,化腐朽为神奇,制作了样式大小不一的匾额。诸如“碑文额”、“手卷额”、“册页匾”、“虚白匾”、“石光匾”、“秋叶匾”等。由此可见,李渔的造园实践极其出色地践行了他在理论上一贯主张避免趋同、力求独创的审美追求。

注释

①文中引文凡未注明的,均出自李渔的《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 [1] 李渔全集(第一卷)[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129-241.
- [2] (清)胡祥翰. 西湖新志[M]. 沈云龙, 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1: 314.
- [3] 王荣初. 西湖楹联欣赏[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6: 175.
- [4] (清)钱泳. 履园丛话[M]. 张伟, 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20.
- [5] (清)麟庆. 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4.
- [6] 陈从周. 梓翁说园[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25.
- [7] 陈植. 园冶注释[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47.
- [8] 李根源, 曹允源. 民国吴县志(一)[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9] (清)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俞平伯, 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Elucidation on Nationalism of Sun Yat-Sen —Taking Sun Yat-Sen's Speech on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s an Example

LU Wen-xu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Zhongshan Institut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Abstract In Sun Yat-Sen's speech on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in his last years of life, some viewpoints on nationalism contradict the KMT Declaration and the KMT Constitution. If researching Sun Yat-Sen's actual psychology procedures, we can find true Sun Yat-Sen's Thoughts. If giving those new thoughts modern definitions, it will bring solutions to China's national problems.

Key words nation; country; a nation's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 a nation's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 nationalism; civil society

On Art Influencing on Li Yu's Gardening Design Thought

ZHANG Qian-ku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No matter in practice as well as in theory, Li Yu is one of the gardening design exper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 gardening design thought is mainly embodied in his book "Xian Qing Ou Ji". This thought is not only rich and deep, but also extremel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He regarded gardening design activities as art activities, believing that gardening design activities was a kind of art activities in essence. Therefore, his artistic attainment, artistic personality and aesthetic ideals had directly produced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effects on his gardening thought.

Key words Li Yu; art; gardening; influence

编辑 刘波 刘深